



李劫人 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劫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

谭兴国等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成都市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

850×1165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3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5059-1030-2/I·751 定价：4.30元

为川坝子人民立传 的李劫老

(代序)

沙 汀

在李劫人故居开馆纪念的时候，我写了一句话：“作为社会活动家和作家，李劫人将永远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则将永远为他的读者津津乐道。”这是我对劫老的总的看法。

关于劫老创作上的成就，郭老作过很高的评价，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在总报告中又特别提出《死水微澜》，认为它和鲁迅的杂文、散文，茅盾的《子夜》，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都是三十年代脍炙人口的作品。

《死水微澜》是反帝反封建的。主人公蔡大嫂正是这类人物。她不满意丈夫，不满意金娃子的父亲，因为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她和罗歪嘴却是情投意合，出于自愿。这种结合使他们真正体味到人生的欢乐。乃至后来发生了教案，罗

歪嘴逃走了，尽管顾天成拼命追求，她都不加理睬。这一方面由于她讨厌顾是教徒，另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她对爱情的坚贞。蔡大嫂这种对爱情的追求、执著，带有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性质。当然，她的这个反封建、个性解放，和后来《大波》里写的黄家表婶不同，她是自发的，出自本能，而黄家表婶追求个性解放，在性爱问题上要求男女平等，却带有自觉性。她明确地向人宣称，你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为啥不可以多有几个相好的？！这种差别主要来自历史条件，蔡大嫂是本世纪初“死水微澜”时期的乡镇妇女，而黄家表婶却是辛亥革命“大波”时期的城市妇女。

对作品的评价，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都不能超越其时代历史条件。比如说袍哥，辛亥革命前与辛亥革命后的袍哥迥然不同。首先是成员问题，辛亥革命前主要是一些游民，做小买卖的商贩，为了对付恶霸、地痞的欺侮，结成团体，借以维护自己利益。他们也真正具有一种豪侠气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先驱者看清了这一点，因而发动袍界参加，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象我们安县那么偏僻的地方，袍界就动员了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开到成都壮大、扩张革命声势，以彻底推翻清朝。

时过境迁，辛亥革命后，袍哥就变质了。看到袍哥十分吃香，有些地方，连县长都当了袍哥大爷，不少地主豪绅纷纷趁机当了袍哥。而且，由于对“单刀会”捐助较多，一经参加就一步登天，当了某个城镇的龙头大爷。这样，袍界的风气，就逐渐变坏了。以至后来的团总、联保主任也和袍界搅在一起，对于人民

更是豪强霸道。

“死水微澜”时期，还有一定的进步性，比如罗歪嘴，他恨洋教、恨吃教饭的豪绅，对官府包庇教民非常不满，这同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当时一般老百姓的思想不可能进一步认识洋人来我国传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侵略和文化侵略，为他们瓜分中国充当先锋。

《死水微澜》是李劫老“大波”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如果从政治上说，在整个系列小说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大波》，它正面写到四川的保路运动，写到辛亥革命。作者本来准备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而由于报刊的敦促，他撇下“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提前写了反映抗战的《天魔舞》。《天魔舞》成书后，按照他的本愿，当然是回转头去，凭借艺术形象逐步完成它以川西坝为基地的近代历史的宿愿。不幸在修订《暴风雨前》和《大波》后，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赍志以没。但按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说，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已属罕见。大体而论，郭老称它们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仍旧是比较确切的评价。

李劫老的这些作品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他不去就历史事件写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事件作为人物活动的条件和背景，多方面地展示整个社会生活，表现各阶层人物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地位、心理、反应。比如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就没有写这件事具体的经过，而是写四川各种人物按其社会地位、文化教养，对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反应，因此人物活跃，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郭老的《反正前后》，也是写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活动，但主要写

他个人的经历。而李劫老的《大波》却把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写到了，可以说是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社会生活 的全貌。

当然，郭老对祖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即以文学创作论，他在诗歌方面的业绩就至今无人企及。而茅盾对祖国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就拿创作小说来说，他的名著也不止于一部《子夜》，而《子夜》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则曾经发生过巨大作用，因为通过对民族资本家、金融家的剖析揭露，他使人们认识到当时革命的主攻对象。巴金的《家》是在国内外赢得广泛赞扬的巨著，作者通过他对“五四”时期四川政治、文化中心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叙述和描绘，尖锐抨击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残暴，同时大力宣扬了当代进步思想。

巴老、劫老都是四川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其题材、内容，也都取自四川，只是从内容、体例上说，《家》、《春》、《秋》等都带有自传性质，而《死水微澜》、《大波》等则来自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如果说立传，他是为川西坝人民立传，而为完成这一任务，他曾经广泛收集资料，然后根据自己身经目击的体会加以融会贯通，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创作。

李劫老写小说的时间很早，1912年就开始了。1915年写《儿时影》，显然受过狄更斯《大卫·科伯菲尔》的影响。《死水微澜》也受到过外国作品的影响。但他逐步进行了深刻融化，因而铸成他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有一次，邵荃麟同志到成都了解四川文学界的情况，由我陪同他到“菱窠”看望李劫老时，曾经当面赞扬过他，说他在表现方法上，真正达到了“洋为中用”的高

标准。李劫老在文学创作上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是因为他文学修养高、功底厚，无论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世界名著，他都认真钻研过，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他对各阶层人物和社会风尚观察非常仔细。这更是他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我们从他《说成都》一类的杂著，就可以看出我的判断，并非出于猜测。

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四川保路运动的情况，他采访了许多置身事变中心的人物。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北岸农村就和杨沧白谈过多次，当时饱经风霜，年已老迈，素又多病的杨沧白，有时放了紧急警报，也等闲视之，从不转移；而他也甘冒敌机轰炸的危险，让杨沧白乘兴畅谈下去。此外，他还收集了不少早年的书画资料，包括一些家族的族谱、祭文，乃至流水帐等，以及外国传教士向本国宗教团体介绍四川乡土民情的信件。

对李劫老，我是先知其人，后读其小说的。我佩服他的创作，更佩服他的为人——正派，有骨气，行侠仗义，“出污泥而不染”。

我还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知道李劫人这个名字了。当时杨森作四川督办兼成都市长，侈谈新政，聘任了很多留学生以壮声势。凡是曾经留学国外的人，只需拜托亲友介绍，他就给你一个“秘书”头衔。有些新政应该说还是办得不错的，如成都的通俗教育馆。而有的却劳民伤财，挂羊头卖狗肉。

“秘书团”中，最有实权又最受杨森重视的是黎纯一，他是教育经费收支处处长。李劫老留学回国后，他以杨森的名义设宴招待，期望李劫老也加入“秘书团”，却遭到拒绝。李劫老不愿仰仗军阀势力，仍回《川报》要他的笔杆子。而黎则认为他

不识抬举。事有凑巧，其时黎纯一夫妇在一家报纸上为他们的朋友、杨森手下干将喻正衡登了一则“为男征婚”启事。因为当时这类事还属罕见，不知哪位好事之徒，竟然也在《川报》上登一则“为女征婚”启事，署名“吕顺意”，显然是影射黎纯一。因为启事中有个条件：“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威古龙丸是当时一种壮阳药。《川报》把它胡里胡涂登了，弄得全市文教界舆论大哗，致使黎纯一十分难堪。于是黎借机在杨森面前挑拨，说《川报》与杨作对。结果《川报》被查封，同时李劼老也被抓去拘留起来。经过亲友多方活动才得保释。后来，名教育家夏斧私做了一首曾在私人中传观的打油诗：“博士无聊说电影，秘书有劲着洋装，报纸无端遭封禁，威古龙丸引兴长。”可以说把杨森和他的秘书班子大大嘲笑了一番。

“博士无聊说电影”指的是杨吉甫的事迹。此公是留美的经济学博士，当时相当有名，但在成都发挥不了作用，只好到电影院去作解说。当时青年会放映的电影大都是进口的无声片子，杨就在放映时向观众解说影片的故事情节，有什么意义等等，让观众乐于接受这一新生事物。

“秘书有劲着洋装”则指的杨森和他的秘书班子，为了表现新派作风，一律西装革履，平时喝洋酒，吃西餐，杨森本人唇上还蓄一撮东洋胡子，同时还讨了好几个小老婆……

后面两句是指杨森查封《川报》事，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劼老那种“出污泥而不染”、决不与黎纯一伙同流合污的品格。

抗战时期，李劼老是中华文艺界抗敌会成都分会的主要负责

人。他在分会的作用就相当于老舍先生在重庆总会的作用，而由于乡土关系，在某些方面，作用更为突出。举例说，分会想找间房子作会址，我们通过冯沛然去找张志和交涉，想从他的公馆里分几间，他不同意，我们只好把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李劫老的办公室作了联络点，把牌子挂在那里，分会开会也在他的办公室开。皖南事变后，李劫老还掩护过两三位进步作家。此后，只要谁上了黑名单，他就请谁到菱窠隐蔽几天，然后设法帮助他远走高飞。

陈翔鹤同志曾经向我说过，1949年3月，《新华日报》撤离之后，成都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他从组织上得到消息，自己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了，就找李劫老商量，李劫老让他在菱窠躲了几天，然后送他到乐山去，改名陈竞波，安排在嘉乐纸厂工作。直到1950年，我从安县雎水乡到成都，在“文管会”工作，陈翔鹤才从乐山返回成都。

解放前在成都文艺界的进步人士，一提到李劫老，没有不佩服的。而首先是佩服他的为人。这也充分说明，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堂堂正正做人，否则将有愧于作家这个称号。

DE6013
目 录

1	为川西坝人民立传的李劫老（代序）	沙 汀
1	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 ——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及其在 文学史上的地位	杨继兴
20	李劫人的创作在我国长篇小说中的地位	谢武军
36	晨曦薄露与旭日初升 ——李劫人早期小说和《狂人日记》在 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李士文
59	略论李劫人短篇小说的美学追求	张义奇
75	李劫人小说的艺术手法	伍加伦
92	李劫人历史小说结构谈	阿 明
105	语言的瑰丽宝库 民俗的百科全书 ——李劫人长篇历史小说独特风格探微	张玉林

115	李劫人小说的乡土文学特色	李士文
134	“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 ——李劫人三部曲的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	艾 芦
153	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地方色彩	胡永修
165	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	谭兴国
190	论蔡大嫂的性格运动	李左人
215	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邓幺姑	冯慧云
228	蔡大嫂与包法利夫人	王锦厚
237	《死水微澜》中若干次要人物的安排和塑造	杨继兴
253	《死水微澜》与现代长篇小说的环境描写	陈 奔
269	修辞精美 锦上添花 ——谈《死水微澜》中的反复艺术	谢 君
281	浅论“死水”和“微澜”	燕 白
294	《死水微澜》的美学探索	张大放
303	李劫人与法国文学	伍加伦
318	郭沫若与李劫人	李士文
333	李劫人、老舍创作中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张效民
353	后记	成都市文联编研室

长篇历史小说 传统形式的突破

——论李劫人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及其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杨 继 兴

李 劫人表现四川辛亥革命历史进程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五四后最早出现的新长篇历史小说^①。本文不准备探讨李劫人历史小说在语言、体例等方面显而易见的革新，而集中从创作模式这一角度着手，谈谈李劫人对我国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根本性突破，以及这种突破为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新风貌，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李劫人作品的重要历史地位。

1

模式是一个作家自由和局限的象征，对于长篇历史小说作家

^①李劫人的历史小说初版于三十年代，修改再版于1962年前，无论初版还是再版，均属五四后最早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先于姚雪垠的《李自成》。批评界视《李自成》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不正确的。

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一定的创作模式总是与作家对历史运动一定的理解相联系的，是作家从特定的历史观念出发，试图把纷杂繁复的历史生活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创造，使之成为秩序井然、充满规律性的艺术世界的结晶。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最集中地反映了作家头脑中的世界本体模式，或沉淀着一个时代的作家用艺术的方式把握历史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发端于宋元讲史话本，正式崛起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此后作为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脉，直至民国初年绵延不绝，各种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若从创作模式的角度考察，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摆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不朽之作的巨大影响，而形成了以前者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和以后者为代表的讲史性英雄传奇两大传统模式。历史演义采用编年体，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为纲，统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显赫历史人物的活动，敷陈历代的争战兴废、权力更替，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诸种联系中，达到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揭示和价值判断。《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直至清末民初蔡东藩撰写的历代演义，均属于这一类。讲史性英雄传奇则采用记传体或扩大的记传体，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等显赫历史人物为叙述中心，集中渲染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把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作为他们施展文韬武略的背景，着重从显赫历史人物的个人活动和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历史生活的风貌，寄寓作家的主观评判，《说唐》、《说岳》、《杨家将》、《英烈传》直至清末的《洪秀全演

义》，均属于这一模式。

如果立足于历史观的高度透视这两大传统模式，则不难发现：无论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的历史演义和以显赫历史人物为中心的讲史性英雄传奇，其理解、把握历史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它们均是从社会上层政治、军事、外交、宫廷生活和与此有直接关系的上层历史人物（包括群众领袖）的活动中，来认识历史的内容和揭示历史的奥秘的。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作家持有的封建主义历史哲学——“英雄史观”、“天命观”等，这种封建时代的历史哲学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理解”，制约着作家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整理、创造思维过程，使作家集中在上层社会和杰出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寻找打开历史奥秘的钥匙，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模式。传统历史小说的这一特征与传统史学偏重于上层政治、军事、外交史和大人物史的倾向是一致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历史演义与司马光的《通鉴》、袁枢的《通鉴记事本末》，讲史性英雄传奇与司马迁的《史记》之间结构的类似^②，它告诉我们，传统的史学家和小说家在以不同的方式把握历史时，怎样同受封建历史观的支配。

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试图把握四川近代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时，完全摒弃了历史演义和讲史性英雄传奇的既定创作模式而另辟蹊径。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中，他一反传统长篇历史小说或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纲、

^②有关古典小说与史学著作的联系，万光治在《中国古代小说结构与历史编纂形式的平行纵向观》一文中有关专题论述，见《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二期。

或以显赫历史人物为描述中心的定型构思，富于创造性地选择既是普通人、又在心理和命运上或代表当时重要的历史力量，或包含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角和艺术描写中心，使主角的私人事件与重大历史动荡以合乎生活直接性的具体方式联系起来，形成小说的结构轴心。围绕这一轴心，作品又通过与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有种种联系的次要人物和事件，把笔触伸向社会各层次、历史生活的各角落，构成贯通社会众多侧面的经络。与此同时，再详尽地描写那一历史时期的环境和风俗。这样，就使作品具有了一个既有与重大历史潮流密切相连的情节主线，又有沟通各阶层历史动向的支脉的立体框架，能够将历史风云与普通人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从上层社会和中下层社会，社会历史与世情民俗互相渗透、影响、制约的复杂关系中，展出历史的风貌和揭示历史运动奥秘。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小说的新模式，其突出的特征是从传统模式偏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和显赫历史人物的正面描述转变为寓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动于广阔的社会风俗史画面的勾勒。《大波》则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它舍弃了前两部作品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框架，采用了与历史演义类似的重大历史事变为纲的编年体，但又不象历史演义那样把视野局限在上层社会的范围内，而是按照四川保路运动这一制约其时四川社会生活全局的历史潮流的发生、发展过程，在上、中、下层社会和政治、军事、世情、民俗的广阔空间中，对那一历史时期四川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进行综合性描写，用四川辛亥革命的进程，统率包括显赫历史人物和芸芸众生在内的各阶层人物活动和各个生活局部的动荡，全景地展现其时的时

代风貌。这显然又是一种历史小说的新模式，其根本特征是借助于无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的全开放性框架，力图把历史还原为由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日常生活、家庭私生活组成的宏大生活流，熔政治、军事、风俗史为一炉。

与传统模式的产生受制于传统历史观一样，支配李劫人用新模式取代传统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作家历史观念的变更。五四以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给包括李劫人在内的现代作家带来了透视、理解社会历史的新眼光、新观念，在他们看来，历史运动再也不是上层统治集团矛盾冲突和少数显赫历史人物的孤立产物，而是社会各种力量基于经济、政治、种族诸因素互相矛盾冲突的复杂运动过程。在这个综合性的运动过程中，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历史动向、显赫历史人物活动与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的意欲、重大历史事件的进展和 社会 日常生活、风土习俗的变迁，都不是互相绝缘的，而是渗透交织、彼此依存，共同组成了立体的历史生活。从这种“总体史观”出发，单纯表现上层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和显赫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演义及讲史性英雄传奇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作家的需要，如同李劫人在《“大波”第二部书后》中所说：“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上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李劫人历史小说的新创作模式，正是适应作家力图从构成历史生活的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中去理解、表现历史的内在欲求而产生的，只有摒弃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作家才能用艺术的方式充分描绘

出世界本体在自己头脑中留下的、与古典作家不同的印象。

2

人类对历史运动的认识和艺术表现，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伴随着这一发展进步过程而更迭衍变。特定的模式集中体现着特定时代的作家认识、把握历史的能力，并决定了作品能在什么样容量、层次和深度上达到对历史运动的描述。

李劫人的历史小说较之最成熟的古典历史长篇《三国演义》、《水浒传》，在艺术表现上明显存在着差距，其中，《死水微澜》最为圆熟，而《大波》气魄宏伟却失之粗疏，可挑剔之处是不少的。但这决不排除《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在反映历史生活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先进性，如果排开具体的艺术技巧而把比较建筑在作品表现历史运动的广阔性、立体性和深刻性上，则不难看到由于旧模式的摒弃和新模式的确立给作品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作品容量的扩大和层次的丰富，新模式能使作家多侧面地、立体地达到对历史生活的把握。

传统长篇历史小说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反映历史生活的孤立性、狭窄性。无论历史演义和讲史性英雄传奇都把艺术笔触高度集中在政权斗争核心的小范围内，很少逸出上层政治角逐、军事纷争、外交纠葛、宫廷冲突及杰出历史人物文韬武略的领域，即使